

资政通鉴

(三)

通变卷·任贤卷

徐颂陶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政通鉴 .3, 通变卷、任贤卷/徐颂陶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9

ISBN 7-80146-639-X/D·55

I. 资… II. 徐… III. 政治—古籍—汇编—中国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3469 号

书 名: 资政通鉴 (全 5 册)

主 编: 徐颂陶

责任编辑: 王秀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 联 方 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78622 电 传: 66078622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奥隆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0

字 数: 17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46-639-X/D·55

定 价: 190 元 (全 5 册)

(凡中国社会科学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资政通鉴》编委会

编委主任

- 张学忠 国家人事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李至伦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部副部长

主 编

- 徐颂陶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主任、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

学术顾问

- 王钟翰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学家
赵宝煦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政治学家
韦庆远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 历史学家
白 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政治学家

编委（以姓名笔划为序）

- 王子今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苏祖勤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吴 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司长
吴爱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余兴安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杨大方 中央民族大学成教学院教授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柏 桦 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姚礼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郭洪纪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总编、教授
徐 刚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章 涛 北京人济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彭 林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蔡 锋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总编、教授

北京人济东方文化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主 编

徐 颂 陶

副 主 编

余兴安 章 涛 吴 帆 柏 桦 蔡 锋

著 译 者

(以姓名笔划为序)

王云访	王晓美	王新华	李金生	李景慧
吕鹏军	向 辉	牟 章	刘宗发	苏祖勤
吴爱明	何 滨	余兴安	宋珂君	张 健
张丽杰	张丽萍	陈 锐	杨大方	杨兴猛
杨宗平	郑宝华	柏 桦	赵 珍	姚继荣
郭宝平	郭洪纪	秦 飞	贾 春	贾开艺
夏宏图	徐颂陶	袁向前	韩新路	葛 荃
蔡 锋	翟江虹	戴红亮		

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蒋正华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数千年甚至近万年前就已开始了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增长，保证民生安定，推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也有过无数惨痛的教训。先秦诸子及后世大儒们所研究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建立圣贤政治的问题，历代贤明君主、廉吏能臣论治乱兴亡，察得失成败，闪亮的政治思想形成了一座蕴藏丰富的智慧宝库。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再也不会有人言必称三代，行必尊五帝，但古代政治思想中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的道德观念，民为邦本、立政为民的价值观念，礼法兼备、注重德治的治政观念，修节止欲、操守为先的节操观念，尚贤使能、德才兼备的用人观念，通权达变、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念，以及治理泱泱大国的丰富治政经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而现实是过去历史的继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生存发展，是不能撇开历史的。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且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就不可能透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系统地洞察问题的渊源，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提出的大政方针，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职责，更不要说在复杂的环境下明察局势，从容应对了。

领导干部读史，以史为鉴，这是与时俱进、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的基本要求。作为领导干部，既要有现实的眼光，又要有历史的修养，否则，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各种利益的诱惑面前，就难以明辨是非，鉴别真伪；在困难与挫折面前，就难以克服畏难情绪，百折不挠，永葆旺盛斗志；也难以制定符合国情、顺应民心、合乎时代发展潮流的高水平、有远见的方针政策。所以，从古代政治智慧中学习一些加强修养的功夫，掌握一些治政临民的经验，感受一些古人高风亮节的薰染，是很有必要的。

京内外数家大学、研究院的几十名专家学者，费时数年，从卷帙浩繁的古代经典文献中博选精诠出 1500 余篇有关治国之道与为官之道的文献，认真点校，精心注译，编成《资政通鉴》一书。全书共分修身、齐家、力学、治政、通变、任贤、亲民、廉洁、谋断、驭众十卷，各卷又根据内容分为若干篇。披览全书，各种修身要诀、从政理念、治国方略，无不毕集。虽源于传统典籍，但以现代观念加以编辑，仍能给人清新之感。许多篇目的确耐人寻味，发人深思，予人启迪。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目前深入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修养必将发挥有益的作用。

是为序。

前言

徐颂陶

悠悠五千年的中国古老文明，蕴藏着无比瑰丽的智慧宝库，形成了日益丰富、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中，肇始于尧舜禹时代的治政理念与治政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为官治政观念和官吏管理制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中最为亮丽的瑰宝。因此，有的学者把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和官吏管理制度，称之为除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以外的第五大发明。

(一)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创造的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的综合象征。它使代际之间、历史阶段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和同一性，成为一个社会生存发展的秩序和基础，创造和再创造的文化密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广阔，其中古代官吏管理制度和为官治政之道便是它的核心，并在世代传承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

把古代官吏管理制度与为官治政之道相互衔接、融为一体、不断丰富发展的，主要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代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以治政为人生本位，以服膺于“仁政”、“圣治”为目标，修身、治国、平天下，把仕途作为自己生命的主旋律，即使宦道挫折，退隐山林，还往往充满着对现世的忧患。他们在参与国家管理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治政理念和经验，如民为邦本、立政为民的价值观，修节止欲、操守为先的道德观，礼法兼施、注重德治的治政观，尚贤使能、德才兼备的用人观，通权达变、与时俱进的发展观。这些丰富的为官治政理念，至今

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了解古代为官为人和治政之道，是我们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要义和政治伦理真谛的重要途径。

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就连自称逍遥的老庄也不例外。从《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张，《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目，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论绝唱，处处洋溢着中国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情怀，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纶、治政智慧、道德理念及对人为官的人生感悟，其中不少是超越时代限制的真理认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正是这些超时空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支柱和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文化传统是传承的连续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不能撇开历史。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人为官和治政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渗透在人们的脑海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既是我们独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中必须要冲破的一些桎梏。中国古代文化有许多好的传统和珍贵东西，像儒家学说虽然有消极因素，但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在传承道义，维护人性尊严，探讨个人身心性命如何调节，个人与社群如何健康互动，人与自然如何维持和谐，人心与天道如何能够相辅相成等方面，儒家的价值观与现代伦理道德没有根本的矛盾冲突，即使是所谓封建的“父母官”意识，也体现了对当权者必须勤政爱民、操守廉洁的责任要求与道德要求。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为官之道，只要我们剔除糟粕，结合现实，继承发展，赋予新的合义，就会产生新的生命力，就会使我国的优秀

民族传统精神得到承继与发扬。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邀集京内外几十名专家学者，经过数年的辛勤工作，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博选精詮，编辑出版了这部史海钩沉、文献荟萃的《资政通鉴》，它从修身、齐家、力学、治政、通变、任贤、亲民、廉洁、谋断、驭众等十个方面，力图科学地发掘和总结中国古代为官治政的传统精华，以作为干部的读史教材，作为对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三个文明建设”，特别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份贡献。

(二)

历史上议论最多的莫过于“为政之道”。所谓“国正天下顺，家和万事兴”，就是强调国家有道有德，才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如果人们无道无德、不受道义的约束，那么就会政令不行，社会失序，甚至带来内乱外患。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这样谈论“为政之道”，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古知今，以往验来。”纵观历史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如周初的圣贤之道，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都说明道德教化对政治的作用。从历代的明君贤相来看，如伊尹之辅佐商汤，周公旦之辅佐成王，还有齐桓公时的管仲，汉高祖时的张良、萧何，三国时的诸葛亮，唐太宗时的魏征，北宋时的范仲淹，明初的刘伯温，清末的曾国藩等，他们都是强调治国要尊道施德的。

不仅如此，古代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方面，也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如通过科举考试和吏部加试来铨选、任用官吏的办法，都说明了只有经过“身、言、书、判”的严格挑选，才能进入仕途。而且，一个人为官，如果不孝顺父母，不亲和兄弟，品德不端，行为暴戾，即使再有才能，也不会得到重用。可见，权力的运用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道德的优先性，依赖于文化

系统对权力运作结构做出的合理阐释，任何朝代都将道义得失摆在与自己命运攸关的地位。

历史还证明，每当朝廷面临官吏腐败和政治无能的困扰时，也是社会民生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像史书中提到“朝廷财用不足，府库虚竭，士卒骄惰”的情况，往往又是各种弊端积重难返之时，因此又出现像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清代的于成龙等清官廉吏，他们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以修复朝廷失德的现象，重建受到损害的施政权威。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秩序是本体在宇宙运行中创造出来的形式，即盛世美德的秩序。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讲道德与秩序的关系。而人心衰坏、社会腐败等现象的出现，都是对秩序的破坏。它打破了和谐的社会关系，销蚀了美好的社会风尚。特别是那些握有一定权力、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官职人员的道德沦丧，容易引发社会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的紊乱，甚至造成社会失序、犯罪迭起的非正常状态。所以，在古代圣贤们看来，吏治的关键是加强为官之人的道德修养，严格规范管束，通过建章立制来监督权力阶层的公务行为和个人行为。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核心，在增强社会凝聚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历代都把“明大道，遵礼法，施德政，淳民风，敬神灵，祭祖宗”，作为实现社会安定、国富民强的为政要诀。反观我们自身，我们在行政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便是与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认识不足，继承发扬不够，从而造成一些官员对“为政以德”、“为政以信”、“为政在仁”的传统价值不屑一顾，更没有认识到自己所代表的政治权力的道德楷模意义和对提升社会道德的责任分不开的。

从理论意义上说，传统道德并不包括公民、公民社会以及公民伦理等现代性概念，但它隐含着某些关于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的深刻理念，是从个体感知层面统驭个人行为 and 为官从政的基

础，它不仅适用于日常伦理的生活关系，也适用于公共权力的操作体系，即生活中发挥道德典范的楷模，职位上尽到勤政爱民的责任。

在中国传统的为官为人和治国之道中，“为政以德”不仅作为治国的方略，作为为官立身和从政的准则，而且也是人格道义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和价值的具体体现。所谓“闲之以礼，纠之以政，行之以义，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就代表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一种基本价值，曾广泛地融入古代为政理念之中。“民无信不立”、“以信待天下”的古代政德民风，反映了中国民众对政治道德和政治结构功能的重视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并视之为个体内在的“修齐”层面的道德基础，延伸到外在的“治平”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文传统精神，无论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还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为政方略，都具有法制不可替代的作用，使中国古代的官吏制度和治国之道成为具有伦理色彩的治政典范。

(三)

中国历代有关治国之道、为官之道的著述各有侧重，各有短长，法家强调法治，重视短期的治理效果；儒家道家强调德治，注重长期的教化效果。在长期治国的实践中，一些明君良相把二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古代“德法并重”的政治思想。

在法家的代表作《商君书》中强调，一个国家治理得好，要靠法度、信用和权力，如果上面的君王有好法并且守法，下面的臣子也一样，即所谓“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就会天下太平。在商鞅看来，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和春秋五霸都很了解治乱之道，并且公私分明，任人唯贤，认为“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民，五霸以法正诸侯”。

强调尧、舜、三王尊奉的主要是德和义，春秋五霸实行的则主要是法和刑，说明春秋战国时，商鞅、韩非、李斯等人主张变法并采取严法重刑之策，是由国势民情决定的。所谓“乱世用重典”，就是在短时期内或乱世中对社会的贪官污吏从重处罚，并且要“杀贵大、赏贵小”，“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儒家提出了道德教化的安邦治国方略，强调道德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一文中指出：“德，国家之基也”，从而把德治更加系统和强化。儒家认为，国家之所以有权威，不是因为权威具有超人的强制性，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德行和道义，对权力的顺从也就是对国家政治道德的顺从。这表明，儒家对权力的解释从不离开道德的标准而只强调它纯粹形式的一面。《中庸》中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就是强调当权者与道德的关系。而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和驱动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文化精英的表率、社会舆论的评价以及个人的自我良知来实现的。

孔子在《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孔子认为不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普通平民百姓，均要修身、正心、诚意、致知，而这种行道修德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家庭、社区、国家，而是为了普天下人的和平与福祉。孔子还特别强调当权者自律是一个大事，主张“为政在人”。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认为当权者应该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才能实现天下大同的圣贤政治。

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意思是，无私心的人，任其自然，不自认为有德，所以才会有德，反之，有私心的人，虽不失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德行，但反而无德。因此，“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也就是说，人若失去了道和德的追求，仁义礼智信也就全部丧失了。老庄的道家思想还认为，自然人性是由大自然派生出来，本来是无心无情无欲，而善恶、是非、美丑、利害等观念情感的产生，都是自然人性丧失之后才出现的，所以人性的修养应当是去智去欲，归朴返真。他主张国君治世，应当顺应规律，无为而治。在今天看来，老庄的治世哲学虽然有些消极保守，但因是针对古代统治者劳民伤财、横征暴敛的状况而提出的，所以仍不失为治国安民的良策。

介于法家和儒家之间的管子思想，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管仲基于四维伦理——礼义廉耻的深刻认识，提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主张：“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而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又说：“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认为只要“礼义廉耻”这四种伦理能够发扬，便可以实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社会奢侈和腐败之风也会得到遏制。

观其所指，管子的治世思想与儒家为政之道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就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如果凭借行政方式来让民众守道义，或者使用刑罚手段让民众遵礼仪，他们只是暂时地免于做坏事，却没有廉耻心；如果凭借道德来开化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齐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心，而且人心归服，各安其所。在孔子、管子看来，刑罚和政令只不过是政

治的工具而已，并不是革除旧弊、清污涤浊的本源，从前的法令繁杂得像细网那样密，但奸邪伪诈的事情仍然频繁发生，最严重的是官吏和老百姓竞相钻法令的空隙，结果弄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如何调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像“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这些都是强调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群众是否拥戴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古代权力系统总是从道义、自身形象和政治效率方面来思考未来。儒家文化是根据人性中的丑恶和私欲两种不良倾向设立赏罚机制，推行德政与礼治，目标最终是为了社会和谐，各有所安。这里，体恤民情，唯才是举，就是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鼓励贤能，崇尚君子的公信力量和人格权威，以赢得民心；再实施“欲贵者贵之，欲勇者勇之，欲知者知之”，以及“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祈山川，敬宗庙，恭祖田”的宽容举措，满足不同人生命目标的追求和下层民众的虔诚愿望，来顺应民意。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将道德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原则，以德来统治时，不但人民要遵从，统治者也要遵守，将官民一视同仁地要求恪守道德，那才是真正的德治。所以提倡“德治天下”，不但指人民群众要有良好的民风民德，政府官员也要有良好的官风官德，若官员平民都有了道德，德治的诉求就有了现实意义。所以，德治的关键在于教育官员和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启发人们正确处理国家与人民、法纪与自由、全局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去深沉地思考人生、人性、人格等重大问题，反思那些如何做人、做什么样人这些深层问题，进而产生道德自律的内心省悟，达到社会的协调和谐。

从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愿望出发，政治系统的深层要求是

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寻求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的合理性。“德法兼治”的思想正源于此。不可否认，由于文化传统中的德治隐含了强烈的人治色彩，其负面的东西就是树立不起“法律至上”的观念，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形很难根除，从而又给人治和权力滥用留下各种缝隙。所以，我们在借鉴传统德治思想时，必须坚持“以法治国”，防止重蹈人治的老路

（四）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自古以来就将人格、诚信、礼义、廉耻作为立身的精神尺度和标志，作为从政的行为准则，这是古代治国之道在政治伦理方面的重要特征。所以历代王朝一向重视官德、官风、官纪，目标是培养心系王权、造福百姓的理想情操，而清廉为政、清白做人的为官操行，又是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政治安危的重要问题。自古以来，百姓对官员有三条要求：一要勤政爱民，二要克己奉公，三要两袖清风。做到了这些，史书上就冠以“清官廉吏”，反之，则落个“贪官污吏”的骂名。历史上那些流芳百世的“好”官，几乎都具有同一种特征，即慎行操守，勤于政务，秉公执法，不纵私欲，体恤民情，任劳任怨。

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总的倾向是重伦理而轻法理，重贤人而轻制度，所以文化传统中很少考虑如何构造优良政体。因此，封建官僚体制不仅很难改造，而且经过历代修补变得更加顽固。人们始终把“德治”、“德政”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和“忠臣”身上，期盼“青天”和“清官”的再现。然而，历史上圣君贤臣本来就不多，社会的失道失德更是使得善良人性易变。因此孔子哀叹圣贤难遇，人心崩坏。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从不轻易许人以“仁”。但认为君子的境界是可以做到的，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本质善良，品性端正，再辅以礼仪教化就可以成为君子，而“君子”正是国家需要的治世之才。

孟子还认为，君子不仅要有德，还要有“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公孙丑·上篇》）强调“气”，必须在“义”和“道”的引导下，经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达到。君子有了“浩然之气”，为官就能居于仁，立于义，行以道，别以礼，做人也能堂堂正正，勇敢无畏，为人表率。

从政之道首先要有良好的人格和品性。古代推崇的官德、官风是建立在人格和品性塑造之上的，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的自我操守、救世拯民、扶危助困的伟大而深厚的精神力量。一个从政者应该成为一个有德行、有能力、有责任心的领导者。对这种恪守道德的报偿，就是使那些尽义务、尽责任的人得到公正评价和奖赏，让那些贪私欲、渎职责的人受到严厉谴责和惩处。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一个公务人员，他/她是一个儿子或女儿，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上司或下级，同事或邻居，朋友或同学，从人伦角色到社会角色的置换中，道德操守、法纪教育、理想塑造又是人生必须经历的几个层次。最基本的是人格修养，其次是做到遵守法纪，最高层次才是实现政治理念。而人格作为生命活动和道德理想的基础，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外部行为的约束，而是人生和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仁爱、宽和，如果没有人格的基础，政治理想就无处生根。在做人的伦常中，珍视人的尊严、价值和自我约束能力，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言而有信，表里如一；在为官的政务活动中，才能将个体道德自觉意识与宏观社会操控力量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勤政爱民，奉公守法，廉洁自律。这种道德的自觉与自律来自于个体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信念，他们的道德自觉与自律也必然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归宿，这是中华文化延续传承数千年的生命力之所在。

当然，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和为官之道，毕竟是建立在农

业文明基础之上，推崇的只是一种宗法型的社会，而宗法型社会自然要强调人伦，主张人治，轻视个人权利和契约。从一些朝代及其官员腐败的根源上去分析，有许多就是源于这种背景，如家长制和家族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助长了亲缘集团及其权力结构的膨胀和发展，为实行一言堂、家天下，维持没有监督制约的环境提供了土壤。所以，我们在学习、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汲取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实际，与时俱进，创造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新观念、新制度。

（五）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和历史经验，使之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已经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特别是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就业形式多样化了。我们正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这对国家的治理、行政行为 and 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治国之道和从政理念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

从现代社会道德层面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欲望和利益为驱动机制的生活方式，它虽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又具有腐蚀人们的理性道德、以感性欲望来取代精神理想的消极作用。所以，新的政治道德不仅要通过公共权力来维持秩序和进行价值分配，而且要通过国家力量和广泛的教育将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观念推行于社会，不断借助于理性指导的实